

术博物馆藏南宋铜琮式瓶、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南宋乾道九年税记款铜瓶、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元代铜绳耳炉等。复古风潮的流行与兴盛使得铜器制作趋向商品化，铸铜商号与名工巧匠应运而生，创作出兼具古韵与崭新功能的器类，如炉、瓶、壶等，其创造的灵感有些是直接源自三代铜器，有些是转化拼凑三代元素而成。

从宋代开始，金石收藏与考据之学渐盛，古物收藏与鉴定在文人之间蔚然成风，加上商品经济的发达，仿古铜器祭祀的功能大为降低，转而变为个人生活情趣风雅的体现。仿古铜器借由文人雅士的重新诠释，将原本高置于庙堂承载礼仪的家国重器，化身为书斋居室的清雅摆设，成为时人风尚。其中，具有古韵又兼具创新功能的器类有炉、瓶、壶等。炉可作焚香供器，亦可当作摆设品，其造型多从鼎、鬲而来，一改原先作为食器、礼器的功能。瓶可作祭祀摆设也可用作日常插花，多从酒壶的原型蜕变，其种类有贯耳瓶、琮式瓶与兽首（衔环）瓶等。而南宋后期至元代，民间制作的仿古铜器大量出现，这些仿古铜器不仅流通国内各地，甚至通过船舶贸易，远赴东瀛。如在韩国新安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即满载仿古铜器前往日本京都等地交易。

从宋代开始，金石收藏与考据之学渐盛，古物收藏与鉴定在文人之间蔚然成风。

在此次展品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明代雁形铜熏炉铸工精湛，香烟可自嘴喙徐徐吐出，造型既呼应汉代原型，亦复兴13世纪至14世纪仿古传统，彰显明初审美新趋。展厅中还复原展示文物使用场景，给观众带来沉浸式感受。正如李清照《醉花阴》词中所写的“瑞脑销金兽”，一件上博馆藏的明代角端铜熏炉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景德镇青花瓷兽炉并列展示，站在特定的角度，可以看到有烟雾从兽嘴喷出。

在展览的第三单元“永宣垂范、震古耀今”里，“永宣金铜造像”与“宣德炉”也是明代工艺美术的杰出代表。永乐、宣德两朝制作的宫廷造像以其鲜明的风格特征、标准的款识格式，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造像艺术形式，为中国金铜造像的巅峰之作。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宣德炉”，成为铜胎细腻精美、结合鎏金、嵌金银与洒金之高超工艺技术的铜炉代称。本单元特别展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明永乐铁鍍金银天杖、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明宣德铜鎏金孔雀明王像、青海省博物馆藏明宣德赐瞿昙寺鎏金铜瓶等作品。

自明至清，仿古铜器借由文人雅士的重新诠释，业已化身为书斋居室的清雅摆设，不仅成为时人闲逸隽古的风尚，更同时与

民间信仰、佛道仪轨相结合，成为供祭典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祭器的普及对民间信仰和佛教、道教的祭祀仪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根据考古新发现可知，在佛教、道教遗址中多伴随而出仿古铜器，显示当时儒学、佛教与道教祭祀有着使用同样仿古祭器之习惯。

当仿古铜器逐渐步入世俗化后，各种工匠与制铜商号随之应运而生，元代的姜娘子、明代的胡文明等皆是著名的铸铜匠师。而到了清代康熙之时，雍正皇帝命礼官“考按经典，范铜为器，颁之阙里，俾为世守”，以作为皇朝治国的方略之一。乾隆皇帝则进行了多项礼制改革，为规范礼制器物敕命编撰《皇朝礼器图式》，要求祭器袭用古制，并以“周器”祭孔。故在乾隆三十三年赐器国子监；三十六年又亲幸曲阜孔庙，颁赠“周范十事”（内府所藏周朝十器）；四十四年更赐器热河文庙，开创儒学祭礼的新热潮……乾隆一朝，再次将仿制三代礼器的活动推向历史高峰。

在“起居修道、古铜新意”板块中，展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明代雁形铜熏炉、明代胡文明制花卉纹铜炉和上海博物馆藏明代胡光宇制花卉纹铜炉、大英博物馆藏19世纪晚期法国仿乾隆洒金铜双凤壶等铜器。■